

從新發現的一處安平壺窯址再談所謂安平壺

謝明良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摘要

俗稱的「安平壺」，是臺灣歷史時期遺址經常可見的陶瓷標本之一。本文的目的，是介紹中國福建省順昌縣新發現燒造此類製品之高付頭窯址所採集標本情況，進而提示與「安平壺」的時代、產地和用途有關的幾個問題。

關鍵字：安平古堡、安平壺、高付頭窯址

壹、前言

1920 年代以來，臺南安平古堡一帶陸續發現不少施釉壺罐，其胎、釉或尺寸大小不盡相同，但多數造型呈直口、平唇、斜肩或斜弧肩，肩以下弧度內收成平底，亦見肩以下呈直筒形下置餅形實足者。壺罐內外施罩灰白、灰青甚至青白色釉，種類不一而足。多數製品於施釉後將口沿上方部位釉藥抹去，以便摺疊入窯燒造。壺以轆轤分兩段拉坯成形再予接合，故器腹往往可見接痕，而以內腔一圈突痕最為明顯。從流傳至今的完整器或殘片的復原可知，這類壺罐有薄胎和厚胎兩類，其尺寸不一，大者高近 30 公分，小者不足 10 公分，但以通高在 15~20 公分的中型壺最為常見（圖 1）。以往對於安平古堡等臺灣多處遺址所見這類施釉罐有「宋甌」、「宋碕」、「宋礮」、「明磁」、「龍泉窯瓷瓶」、「荷蘭甕」或「龜卵」、「龜甕」等不同的稱謂，而以「安平壺」最廣為人知。如國分直一在 1940 年代已經提到「當發掘熱蘭遮城就會出土安平壺」。¹ 這大概也是中國陶瓷史上唯一由臺灣人以臺灣地名命名，成為臺灣和日本學界約定俗成的稱謂後，近年又逆轉影響及中國考古學界對此類壺命名的特殊案例。



圖 1 私人藏安平壺。

資料來源：私人藏，筆者攝。

1 國分直一，《壺を祀る村》（東京：三省堂，1944 年），頁 111。

安平壺的研究至少涉及三個主要課題，即：時代、產地以及用途。眾所周知，在 1980 年代中國福建省邵武四都窯址資料公布之前，有關安平壺的產地推測均止於主觀的臆測。依據目前公布的資料，邵武四都窯址出土的標本屬薄胎上施罩灰白或灰黃釉類型（圖 2），然而邵武四都窯址的調查報告極為簡略，對於窯址出土包括安平壺式在內標本的年代也語焉不詳，僅只提到「該窯主要在元代鼎盛，可能延續至明代，附近還發現清代青花瓷器」。² 從窯址標本共伴情況看來，筆者同意森達也所指出邵武四都窯址的安平壺標本是明末「安平壺」的早期壺式，³ 可能早於十七世紀明代晚期，但其相對年代是否可上溯森達也所主張的元代？則仍有討論的空間。與此相關的是，以往包括筆者在內在邵武四都窯址安平壺式標本相對年代尚未釐清之前，就逕將臺灣出土或沉船所見薄胎安平壺視為邵武窯製品的做法，⁴ 未免輕率，有必要再予評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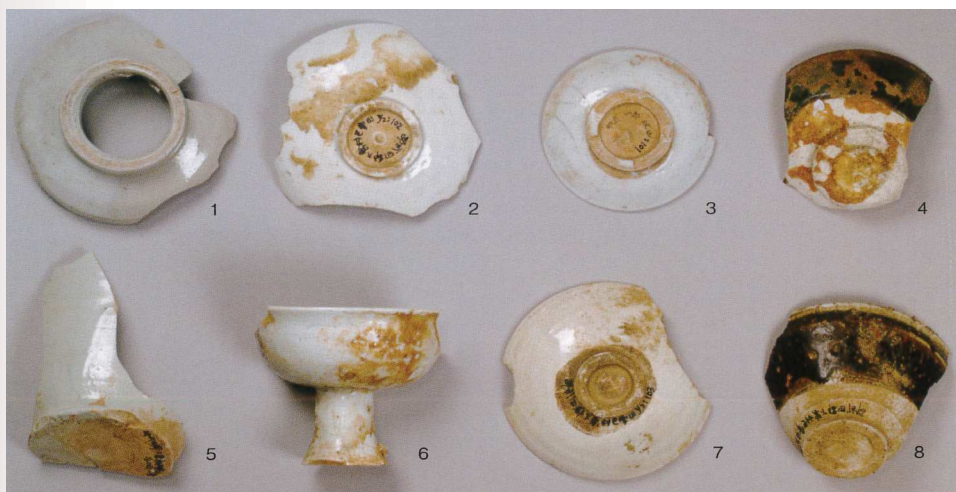


圖 2 福建省邵武四都窯址出土標本，左上及左下為安平壺類型。

資料來源：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の出発点「福建」展開催実行委員会，《東アジアの海とシルクロード拠点福建》，頁 148，圖 112。

- 2 傅宋良等，〈邵武四都青雲窯址調查簡報〉，《福建文博》（1988 年 1 期），頁 19-22。
- 3 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の出発点「福建」展開催実行委員会，《東アジアの海とシルクロード拠点福建》（瀬戸：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の出発点「福建」展開催実行委員会，2008 年），頁 148 圖 112 的解說。
- 4 如：謝明良，〈左營清代鳳山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原載《臺灣史研究》3 卷 1 期（1996 年），收入氏著，《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 年），頁 217-219；或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鄧啓江），〈福建平潭九梁 I 號沉船遺址水下考古調查簡報〉，《福建文博》（2010 年 1 期），頁 18。

另一方面，臺灣所見標本除了薄胎製品之外，還包括許多厚胎灰青釉標本。本文以下擬介紹的福建省順昌縣新發現的安平壺窯址，所採集標本即多屬厚胎灰青釉器，其器形特徵也和臺灣出土部分標本大體一致。

順昌縣位於福建省西北部，是南平市轄下的一縣，與建陽、建甌、南平、將樂、邵武等縣相接，安平壺窯址在縣西鎮際會村高付頭西南丘陵西麓（圖3），也因此被稱為高付頭窯址。窯址未經發掘，僅止於表採（圖4），簡報搭配精美彩圖發表於《大眾考古》第89期（2020年11月），⁵讀者可自行參閱。本文的目的是在介紹表採標本的同時，再次省思前述安平壺的時代、產地以及用途等幾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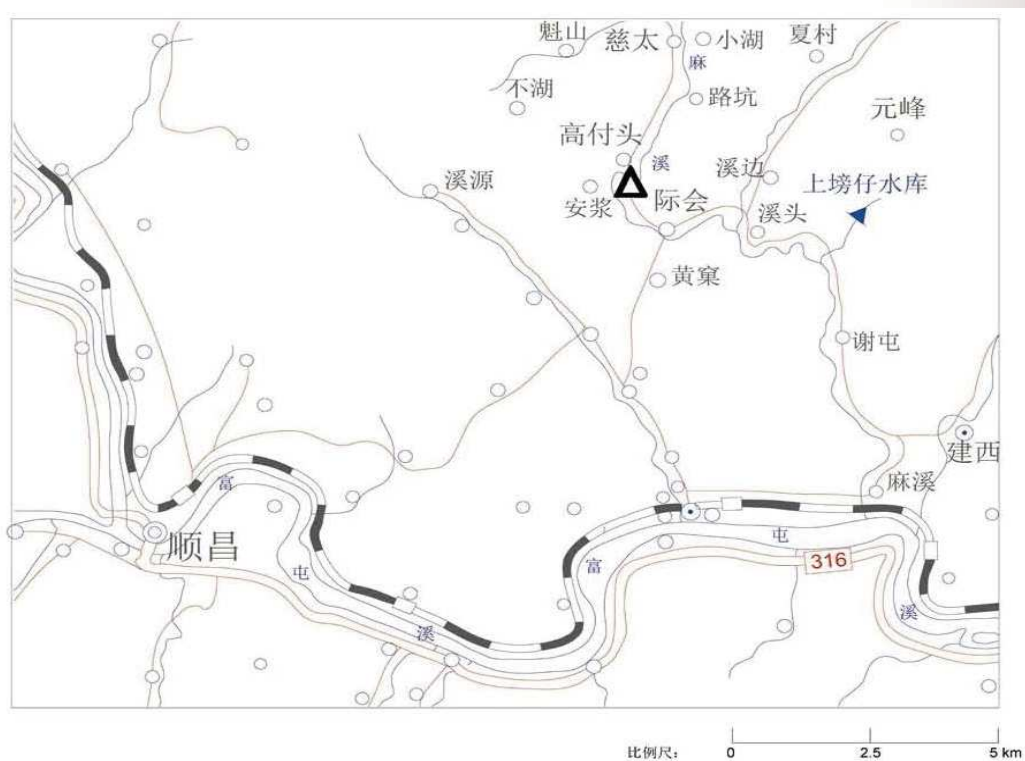


圖3 福建省順昌高付頭窯址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鄭皓元，〈福建順昌高付頭窯址調查〉，頁74。

5 鄭皓元等，〈福建順昌高付頭窯址調查〉，《大眾考古》89期（2020年11月），頁73-80。承蒙老友沖繩縣立藝術大學森達也教授教示並惠賜這筆資料，謹誌謝意。



圖 4 福建省順昌高付頭窯址散布的標本
資料來源：如圖 3，頁 74。

在順昌高付頭窯址採集施釉壺罐標本當中，有幾種標本可以納入廣義的安平壺類型，這包括高僅 9.8 公分的報告者所謂「折肩直腹小罐」（圖 5），和通高在 16~16.9 公分的「折肩斜腹小罐」（圖 6），以及在釉下書有形似「米」或「半」字的「青花瓷小罐」（圖 7）。帶青花字銘的安平壺相對少見，

從新發現的一處安平壺窯址再談所謂安平壺

但臺南市歷史館藏（圖 8）和三上次男遺贈出光美術館的安平壺壺身可見青花「云友」二字（圖 9），兩件字體極為相似，疑是同一陶工所書寫。



圖 5 福建省順昌高付頭窯址採集，圖 6 福建省順昌高付頭窯址採集，
H9.8cm。

資料來源：如圖 3，頁 75。



H16~17cm。

資料來源：如圖 3，頁 75。



圖 7 福建省順昌高付頭窯址採集，圖 8 青花「云友」壺，H18.7cm，
「米」或「半」青花壺。

資料來源：如圖 3，頁 76。



臺南市歷史館藏。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編，《民族文物館
藏品選集》（臺南：臺南市
政府，1979），頁 7，圖 14；
彩圖為筆者攝。



圖 9 青花「云友」壺，出光美術館藏，H19cm。

資料來源：

出光美術館編，《受贈三上次男コレクション図版目録》（東京：出光美術館，2008 年），頁 79，圖 146。



圖 10a 青花「魯文」壺（左），圖 10b 同上，背底（右），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藏。

資料來源：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藏；大橋康二，《海を渡った陶磁器》（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年），頁 67，圖 10。彩圖為作者賜贈。

其次，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藏品壺身釉下青花書「魯文」字銘（圖 10）；國立歷史博物館（圖 11）和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的安平壺壺身則有內容難以判讀以筆繪出的青花方形銘記（圖 12），後者兩件帶青花銘記的中型壺器形厚重，器壁近底處斜削出棱面，底部（璇）修出壁形寬矮圈足（同圖 12b），其和順昌高付頭窯址標本迥然有異，很可能是來自其他尚未發現的窯場所燒造。另外，個別製品可見釉下陰刻「窯四十七丁」等字銘（圖 13），或據稱是在釉下褐彩繪折枝花的標本（圖 14），但後者是否確屬釉下褐彩？希望日後有幸上手目驗。總之，以上諸例正意謂著，今日俗稱的安平壺其實是來自複數多個窯場，當然也不排除福建省以外中國沿海地區其他窯場亦曾燒造的可能性。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留意前引青花「云友」銘壺似有多例（同圖 8、9），印象中臺北徐瀛洲先生也收藏一件同樣青花

從新發現的一處安平壺窯址再談所謂安平壺

字銘的安平壺，顯然並非陶工一時興起的塗鴉，而是有意為之的銘識；兩件筆繪青花方形銘記的厚胎璧足安平壺（同圖 11、12）也可以做這樣的理解。



圖 11a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左），圖 11b 同上，背底（右）。
資料來源：國立歷史博物館藏，筆者攝。



圖 12a 青花印銘安平壺，H19.5cm（左），圖 12b 同上，背底（右），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筆者攝。



圖 13 「窯四十七个」釉下刻銘壺，
H 約 12~15cm。

資料來源：私人藏，筆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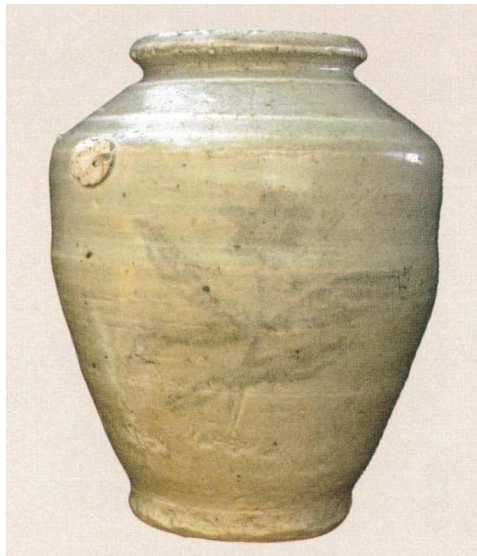


圖 14 「釉下褐彩」折枝花壺
資料來源：

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編，
《水下考古學研究》第 1 卷（北京：科
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98，圖 73。

如前所述，從高近 30 公分的大型作，到通高不足 10 公分的袖珍壺都是所謂安平壺所包攝的內涵。就筆者主觀的認知而言，不同的尺寸很可能正是不同功能的反映，亦即壺內分別裝貯有與尺寸相應的內容物。就此而言，以往在未經型式分類的情況下針對所謂安平壺功能的種種推測，就有以偏概全之嫌。

回顧以往有關安平壺用的說法，計有：食料醬物罐說、藥油壺說、花瓶說、礦物或食物容器說、酒瓶說、火藥罐說，以及不限於單一用途的容器說等種種說法。其中又以酒壺說和火藥罐說最為常見。酒壺說法是《熱蘭遮城日誌》所載中國啤酒（Chinese Beer）可能是蒸餾的米酒，而安平壺即是裝盛這類燒酒的容器。⁶ 如果說安平壺當中的中型或大型壺適合貯酒運輸，而前引高付頭窯址所採集以青料書寫形似「米」字的安平壺（同圖 7），也容易令人聯想是否為內貯米酒的容器？不過酒壺的說法卻很難解釋印尼萬丹（Banten）、戈瓦（Gowa）或布頓（Buton）等理應禁酒的伊斯蘭教王國遺

6 陳國棟，〈「安平壺」與「三燒酒」〉，《臺灣文獻》別冊 8（2004 年），頁 2-9。

址為何頻出安平壺標本？坂井隆因此主張安平壺是內裝茶葉外銷的容器。⁷

早在 1930 年代，連橫已曾提到清代的火藥局內還可見到尚未開封的安平壺，⁸ 又說「似為荷人貯藏火藥之器」，⁹ 火藥罐說在安平壺研究史上有其影響力，近年大橋康二在考量日本江戶時代遺跡出土情況，也傾向認為安平壺是裝貯火藥原料硝石的外容器。¹⁰ 然而我們亦需留意越南海域頭頓號沉船（Vung Tung Cargo）曾打撈出以黑色膠狀物包裹壺口，而後再以藤莖捆繞口沿下方內收壺頸的安平壺（圖 15），此一封裝方式若非二次利用，當可提供安平壺用途的相關訊息；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編號第 108 號墓的安平壺壺頸也仍留有纏繞網綁的草繩（M108C001）（圖 16）。



圖 15 安平壺，H18cm，越南頭頓沉船打撈品。



圖 16 安平壺，H10.7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第 108 號墓出土。

資料來源：

Christiaan J. A. Jörg, Michael Flecker, 陳有貝，《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The Hallstrom Excavation (Singapore: Oriental Art Publishing, 2001), p. 151.

資料來源：

7 坂井隆，〈安平壺をめぐる謎〉，收入佐々木達夫編，《中近世陶磁器の考古学》卷 12（東京：雄山閣，2020 年），頁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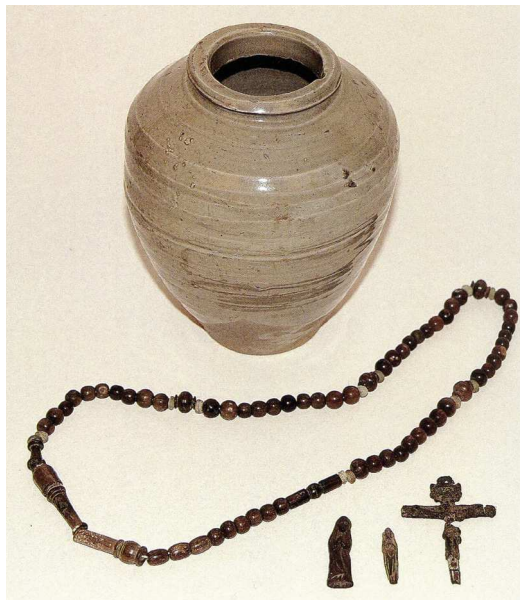
8 連雅堂，〈臺灣考古錄〉，原載 1932 年臺南《三六九小報》，此轉引自朱鋒，〈宋硯（安平壺）〉，《臺南文化》2 卷 1 期（1952 年），頁 51。

9 連橫，《臺灣漫錄》，收入沈雲龍主編，《連雅堂先生文集·餘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頁 150「荷蘭甕」條。

10 大橋康二，《海を渡った陶磁器》（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年），頁 67。

關於通高在 15~20 公分之間中型安平壺的二次轉用例其實時有所聞，比如說臺灣平埔族西拉雅人（Siraya）曾將之做為阿立祖（Arit）公廨祭壇神靈憑靈的道具；¹¹ 日本區域天草市小濱寶遺址出土的安平壺則內置骨質聖瑪麗亞像（圖 17）。

除了上述幾種二次轉用案例之外，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在壺身釉上鑿刻死者姓名或生卒年月做為一種墓誌置入壺內之例。由於字銘是在燒成後的釉上所施行的加工，因此不能保證絕非後人的偽刻，不過從筆者所見坊間偶見的於清代青花



17 安平壺及壺內聖母瑪利亞像、青銅十字架和念珠，壺 H15cm；日本天草市河浦町出土。

資料來源：仙台市博物館編，《伊達政宗の夢》（仙台：仙台市博物館，2013 年），頁 130。

瓷上鑿刻墓誌文及其鐫刻作風看來，安平壺上的字銘極有可能為當時的刻銘。所見壺身釉上刻銘的年代早自「大明正德」（1516-1521）（圖 18），晚迄清代乾隆（1736-1795）（圖 19）甚至嘉慶年間（1796-1820）。設若款紀年可信，則安平壺類型的年代就可早自十六世紀初期正德年間，並可晚到十八世紀甚至十九世紀前期。雖然如此，從臺灣、日本、東南亞等地的出土例，以及截至目前沉船打撈製品，可以確認安平壺類型施釉炻器主要是流行於十七世紀。以紀年例而言，最早見於菲律賓海域 1600 年八打雁（Batangas）幸運島附近沉沒的西班牙聖迄戈號（*San Diego*）沉船，¹² 最晚

11 謝明良，〈安平壺芻議〉，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1995 年），後收入氏著，《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 年），頁 206。

12 Jesus T. Peralta, *Saga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Philippines, 1993), p. 87, pl. 29.

從新發現的一處安平壺窯址再談所謂安平壺

的例子則是前述越南海域發現的伴隨中國干支紀年墨錠相對年代在 1690 年的頭頓號（Vung Tung Cargo）沉船打撈品。¹³



圖 18 「大明正德」（1505-1521）刻銘壺，H 約 12~15cm。

資料來源：私人藏，筆者攝。



圖 19 「乾隆四年」（1739）刻銘壺，H 約 10cm。

資料來源：私人藏，筆者攝。

13 Michael Flecker, "Excavation of an Oriental Vessel of c. 1690 off Con Dao, Vietna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vol. 21, no. 3 (1992), pp. 221-244.

參考書目

壹、專書

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編，《水下考古學研究》第 1 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

連橫，《臺灣漫錄》，收入沈雲龍主編，《連雅堂先生文集・餘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

陳有貝，《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17 年。

臺南市政府編，《民族文物館藏品選集》。臺南：臺南市政府，1979 年。

謝明良，《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 年。

Christiaan J. A. Jörg, Michael Flecker, *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The Hallstrom Excavation*. Singapore: Oriental Art Publishing, 2001.

Jesus T. Peralta, *Saga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Philippines, 1993.

大橋康二，《海を渡った陶磁器》。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年。

仙台市博物館編，《伊達政宗の夢》。仙台：仙台市博物館，2013 年。

出光美術館編，《受贈三上次男コレクション図版目録》。東京：出光美術館，2008 年。

坂井隆，〈安平壺をめぐる謎〉，收入佐々木達夫編，《中近世陶磁器の考古学》卷 12。東京：雄山閣，2020 年。

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の出発点「福建」展開催実行委員会，《東アジアの海とシルクロード拠点福建》。瀬戸：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の出発点「福建」

展開催実行委員会，2008 年。

國分直一，《壺を祀る村》。東京：三省堂，1944 年。

貳、期刊論文

連雅堂，〈臺灣考古錄〉，原載 1932 年臺南《三六九小報》，此轉引自朱鋒，〈宋碕（安平壺）〉，《臺南文化》2 卷 1 期（1952 年），頁 51。

陳國棟，〈「安平壺」與「三燒酒」〉，《臺灣文獻》別冊 8（2004 年），頁 2-9。

傅宋良等，〈邵武四都青雲窯址調查簡報〉，《福建文博》（1988 年 1 期），頁 19-22。

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鄧啓江），〈福建平潭九梁 I 號沉船遺址水下考古調查簡報〉，《福建文博》（2010 年 1 期），頁 13-18。

鄭皓元、栗建安，〈福建順昌高付頭窯址調查〉，《大眾考古》（2020 年 11 月），頁 73-80。

謝明良，〈左營清代鳳山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原載《臺灣史研究》3 卷 1 期（1996 年），頁 229-244。

謝明良，〈安平壺芻議〉，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1995 年），頁 75-105。

Michael Flecker, "Excavation of an Oriental Vessel of c. 1690 off Con Dao, Vietna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vol. 21, no. 3 (1992), pp. 221-244.

Further On the So-called Anping Jar from a Newly Discovered Anping Jar Kiln Site

Ming-Liang Hsieh *

Abstract

The so-called “Anping Jar” is one of the ceramic specimens commonly found in historical sites in Taiwan.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progress on the specimens collection of such artefacts made in the newly discovered Gaofutou kiln site in Shunchang county, Fujian province, China. Further,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period, production site, and the usage of “Anping Jar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 Anping Old Fort, Anping Jar, Kaofutou Kiln Site

* Chair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